

吴佩孚,1874年生,山东蓬莱人,北洋后期直系军阀首领。七七事变之后,居住在北平什锦花园,因留恋故宅未曾南下,日伪方面妄图诱其出山,利用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,在沦陷区组织傀儡政府。但吴佩孚坚持主权,毫不退让,屡屡挫败日伪阴谋。日本特务恼羞成怒,于1939年12月4日,借为吴佩孚医治牙疾之机,将其残忍杀害。

鲜为人知的是,日本人曾经授命大汉奸汪精卫前往北京劝降,吴佩孚以高超的手段,挫败了汪精卫的图谋。

吴佩孚智斗汪精卫



吴佩孚

为掌权,汪精卫替日本人当说客

日本军部侵占北平后,希望实施他们所谓的“南唐北吴”谋略,先后派出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中将和大迫通贞少将,向居住在什锦花园的吴佩孚劝降,但被政治手段高超的吴佩孚一一化解。日本人拿吴佩孚没有办法,却不死心,就把大汉奸汪精卫抬了出来,让汪精卫做说客。

汪精卫知道吴佩孚在日本人人心中的分量,日本人一开始想争取出山的两位中国大人物就是唐绍仪和吴佩孚。如果不是唐绍仪被军统特务刺杀,使日本人的“南唐北吴”计划受挫,也就不会有他汪某人什么事了。虽然时势发生巨大变化,但日本人嫌他是个文人缺乏实力,还是坚持要“汪吴合作”,汪精卫掌管行政,吴佩孚掌管军事。

汪精卫当然不想这样,可日本人一再坚持,汪精卫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“劝进”了。

1939年5月22日,汪精卫给吴佩孚发来电报,先向他大肆兜售汉奸理论“中日两国为敌,则两败俱伤;为友,则共同发达。其理至明。不幸数十年来纠纷胶积,至积至于今日,遂败坏决裂,一至于此。欲谋收拾,且引之于正轨,其事诚难,然又不可以已,且舍此更无他道也。……公老成谋国,如有所示,极愿承教。但求有益于国,任何艰险,皆所不计。”

吴佩孚何许人也?虽然他对汪精卫极为鄙视,但“老成”的他,照样与汪精卫“礼尚往来”,于是双方电报不断,互派信使,表面上彼此敬重,很是亲热,实际上吴佩孚只不过说些客套话,敷衍汪精卫。6月7日,有些厌烦汪精卫喋喋不休的吴佩孚,回了一封掷地有声的电报。电报中说:“窃谓中华民国,四万万民众,实为主体。民意趋向,果以抗战为然,则任何牺牲,均可弗计。若民皆厌战,相战之国,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,即宣矜恤同胞,戛然而止。……诚知民为邦本,和与战同一为民,则应战和,自不能不以民意之向背为准绳也。……故自卢沟桥变起,兀坐故都,本所信念,日以启导和平为事。和平要领,则以保全国土,恢复主权,为惟一之主张。……弟委质国家,誓与国家共存亡,同其命运,苟能河山无恙,自计已足……”

这封电报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吴佩孚的态度,他没有正面斥

责汪精卫的卖国理论,却明确表示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,他作为一个爱国军人,虽然倾向于中日和平,但和平要以保全国家领土、主权完整为前提,他誓与国家共存亡!

吴佩孚见招拆招,汪精卫无计可施

1939年6月26日,汪精卫飞到北平,邀请吴佩孚到日本华北占领军参谋长山下奉文的住宅会面。山下就是日后指挥日军横扫马来西亚、新加坡,最后因为部下制造巴丹死亡行军的战争暴行而被美军绞死的“马来之虎”。他的宅院位于铁狮子胡同。汪精卫历来自视甚高,他在日本人面前卑躬屈膝,但在吴佩孚面前还想摆摆架子。按照中国的古礼和习俗,客人应该主动上门拜会主人,或者主人约在某处会见客人才算是尊重。汪精卫反客为主,竟然想“召见”吴佩孚。汪精卫处心积虑约吴在日本人的地盘上见面,而且还登报声明。吴佩孚要是去了就是自降身价,而且有“跳进黄河洗不清”的汉奸嫌疑。

然而吴佩孚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汪精卫“绞尽脑汁”想出来的办法。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,他也对报界发表声明:吾与汪先生皆中国人,如商国事,当相见之于中国人住所,出日本人宅中,且为日军之参谋长,何以使国人释然?吾辈万一共语一堂,日军部提出何项要求,向吾们结盟,又将何以自处?兹事未必即有,而不敢决其必无。经加考虑,与其遗憾将来,受国人指责,不如不应汪先生招,任其开罪,斯无两全之策也。

汪精卫打电话来,他不接,派人上门请,他不理睬。汪精卫一计不成,又生一计,他表示希望在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宅邸会面。这次虽然在中国人的“地盘”上见面,但吴佩孚照样不同意。

6月24日,他对老友、长期留在他身边“劝驾”的日本特务冈野增次郎说道:汪氏来京,余极欢迎。乞来敝舍一晤最为妥当。余外出相会则为不便,若为警卫上之必要,对外可称系杉山司令官或山下参谋长来访,则采取任何警戒手段亦无妨碍。且余之心境乃仰无羞于天,俯无忤于地,无忤何惧。我不杀人,他不杀我也。且按中国之礼仪做法,亦应为“行客拜坐客”……

汪精卫等得焦头烂额,虽然不断出招,但吴佩孚见招拆招,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。汪精卫的说客纷纷上门,他有一次派了吴佩孚的心腹陈中孚上门来劝,吴佩孚把桌子一拍,大骂道:“谁跟汪精卫合作,这个人一定下贱!”吓得陈中孚落荒而逃,很久不敢登门。

汪精卫派说客反复上门

汪精卫总想比吴佩孚高出一筹,在礼节上占些便宜,可吴佩孚总不让他得逞。他在北平等待多日,吴佩孚就是不与他见面,汪精卫也不肯“尊卑降贵”主动上门拜会。双方在礼节上拉锯了数次,汪精卫见没有结果就悻悻地回去了。

汪精卫又陆续派赵尊岳、陶家瑶到北平来“劝驾”。吴佩孚说,他对汪精卫离开重庆深表可

惜,他指出,汪精卫在日本挟持之下,空言救国,实则亡国也,他绝不会与之“同恶相济”。

然而汪精卫铁了心想当汉奸,吴佩孚的出山与他关系太大了。汪精卫一再强调国民党的“法统”,吴佩孚表示“难以接受”。1939年10月2日,陈中孚作为吴佩孚的特使,与汪精卫举行谈判。陈中孚对汪精卫表示,吴佩孚对汪精卫要求承袭“国民政府”名称,“意见很大”,吴佩孚有“投降”的感觉;另外,吴佩孚对于汪精卫以“国民党专政”的想法也不敢苟同。陈中孚建议汪精卫将“政府”与“党”区别对待。这场谈判是在日本梅机关的策划下进行的。吴佩孚派出的特使是已经“落水”的陈中孚,陈中孚还帮着汪精卫出主意,可想而知,吴佩孚对待与汪精卫谈判是什么态度了。

汪精卫对吴佩孚的“接触”态度深表满意,吴佩孚总算答应和他谈具体的细节问题了,怎么说也是很大的进步。10月19日,好了疮疤忘了痛的汪精卫又兴冲冲地给吴佩孚写信,他托陶家瑶呈吴佩孚。在信中他向吴佩孚作了解释,恬不知耻地标榜自己是“忠侠”之人,他也希望吴佩孚做“忠侠”之人,文字之无耻、谄媚,令人齿冷:“由是言之,今日国民党人主张恢复国民政府,其为国民政府谋,忠也;非国民党人亦主张恢复国民政府,其为国民政府谋,侠也。一忠一侠,而为国为民之心事则同。”

吴佩孚给汪精卫戴高帽子,坚持主权不退让

吴佩孚在汪精卫的信封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作为回信:“复。公离重庆,失所凭依;如虎出山入柙,无谋和之价值!果能再回重庆,通电往来可也。”

11月4日,吴佩孚正式给汪精卫回信。他在信中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汪精卫的谬论。汪精卫宣称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当局没有处理好对日关系,应该“引咎辞职”。言下之意,只有他才有资格负起“实际政治之责任”,他叛逆、另立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。吴佩孚指出,中国百年积弱,国民党政府兴起不过是机会比较好而已,国民党政府奉行党治,所以仅仅把抗战的不利局面归咎于军事当局,“似不免稍失其平”。他“愿公持宽大之论,藉免内滋不协,外复示人以间,大难未夷,尤以共谅解为宜也”。意思是说,汪精卫应该客观公正地做出判断,以避免国民政府内部分裂,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,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各派政治势力,应该同仇敌忾,相互谅解,以共赴国难。

他告诫汪精卫:“法律方面即不能同时有两政府之存在,万一外内未经协调,和议已臻成熟。一方即组织政府,而重庆之政府依然健在,听之则属非法,或致有碍和约之履行,反之则西班牙殷鉴不远,而人民亦将不堪其命。”如果汪精卫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与国民政府公开分裂,“诚国家不幸中之尤不幸矣”。

吴佩孚给汪精卫戴了一顶高帽子——佩服其勇“当收拾时局大任”;还拉了拉关系——与他有过“同心断金之约”,但他明确提出希望汪精卫能够使国家之“主权、土地”“悉得保全”。说白了,他反对汪精卫当汉奸。

康狄《钟山风雨》

从康熙开始 清朝秘密建储

今北京昌平区有个郑各庄,清代称郑家庄。乾嘉时期的礼亲王昭槤曾写道:“理亲王府在德胜门外郑家庄,俗称平西府。”他说的这个理亲王,即康熙帝之孙、废太子允禔的长子弘晔。清代王府建在城外,仅此一例。追溯郑家庄王府的历史,要从允禔谈起。而这个地方,还是康熙秘密建储计划的一部分。

防范废太子复立成为心病

康熙五十一年十月,皇太子允禔第二次被废黜。直至10年后康熙帝病逝,清廷未再册立储君。其间,诸皇子图谋储位,拉党结派,争斗愈演愈烈,极大地牵制了康熙帝晚年的精力,对朝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。

康熙五十四年夏,准噶尔部突袭哈密,清廷调兵遣将,西征之役拉开帷幕。被软禁于紫禁城内咸安宫的废太子允禔认为,这是自己再次复立的机会。当时恰逢他的嫡福晋瓜尔佳氏患病,医生贺孟頫时常前来诊治。允禔遂以砚水亲笔作书,让贺孟頫送给镇国公普奇,嘱托普奇保举他带兵西征。此事很快被告发,除允禔外涉案者均受到惩处,但他仍未死心,继续寻找复立之机。

此时朝中不断有大臣奏请立储,康熙五十七年,满洲正红旗人、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上密折请求复立允禔为皇太子。康熙帝亲自审讯后,命将朱天保押至平则门(今阜成门),在其父朱都纳看视下正法。此前,虽然不断有大臣奏请立储,但均未提出储君人选。朱天保指名复立,康熙帝深为震动。他感到,废太子在朝中仍有一定影响力,对皇权的稳固是潜在威胁。3年后,汉族大学士王揆再次密奏建储,虽然未提出储君人选,但康熙帝勃然大怒,称王揆等“以朕衰迈,谓宜建储,欲放出二阿哥,伊等借此邀荣,万有一事,其视清朝之安危休戚,必且谓与我汉人何涉……”如何防范允禔复立,成为康熙帝晚年的一块心病。

朝中部分大臣此时仍看好允禔,这同其子弘晔有一定关系。允禔嫡福晋瓜尔佳氏不曾生子,侧福晋李佳氏所生长子早卒,她生的二子弘晔就成为允禔的长子。

弘晔聪慧伶俐,自幼为康熙帝喜爱。允禔第二次被废黜时,弘晔19岁。在时人眼中,允禔虽然被废黜,弘晔却一直是康熙帝的爱孙。

康熙建造行宫,有意让废太子住

康熙五十六年底,康熙帝经过反复比较,最终属意于皇十四子允禵。为了吸取两立两废皇太子的教训,康熙帝决定在册立之前,不再公布储君人选,实行秘密建储。由于年事日高,他曾打算于次年春举行册立大典,让新立太子襄理政务,分担其劳。康熙五十七年初,还特令大学士等修改以前定得过的皇太子仪注。恰在此时,准噶尔部派军攻入西藏,拉萨失守。于是,康熙帝将立储一事暂且放下,任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率师西征,其意是待允禵建立军功、班师返京后,再将他册立为皇储。

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,允禵率师出征。康熙帝在决策西部军务、日理万机的同时,开始为消除允禔的影响与威胁,保证自己所属意者顺利继承皇位进行一项重要准备。

据满文档案记载,允禵出征当月,康熙帝决定于顺天府昌平州内,距京城20余里的郑家庄建造行宫、王府、城楼及兵丁营房等设施。康熙六十年十月,郑家庄工程告成。次年三月,康熙帝与大学士、都统的谈话中,首次提及此事:“前因兵丁蕃庶,住房不敷,朕特降谕旨,多发帑帑,于八旗教场盖设房屋,令伊等居住。近看八旗兵丁愈多,住房更觉难容。朕思郑家庄已盖设王府及兵丁营房,欲令阿哥一人住。今令八旗各佐领下,派出一人,令往驻防。此所派满洲兵,编为八



康熙

佐领,汉军编为二佐领,朕往来此处,即令伊等看守当差。”康熙帝虽然没有指明让哪位皇子移住彼处,但雍正帝继位后透露:皇考已有让二阿哥移住郑家庄之意,“因无明旨,朕未敢擅自办理”。可见,康熙帝拟将允禔移住郑家庄之意,皇子们一清二楚。

雍正将秘密建储定为制度

郑家庄府邸乃是废太子将居之所,康熙帝于此不便明言,暂以王府称之。依照常理,康熙帝不会让尚未成年的小阿哥远居郊外。成年皇子中,除去被软禁在原府邸的允禔与幽禁在咸安宫的允禔,其他皇子常被委派办理政务,于康熙帝离京期间,轮班值守紫禁城与畅春园。如果迁居郑家庄,不仅上朝不便,承旨办事也会受到限制。允禔既已软禁家中,就无迁移必要;唯有允禔,于紫禁城内幽禁数载,既非长久之计,对再立储君亦有所碍。因此,尽管西征军费浩繁,康熙帝仍决定启动郑家庄工程,历时三载竣工。

此时,允禵正在西北前线筹划进军准噶尔的军事行动。康熙六十一年春,清廷决定与准噶尔议和,尽快结束战事。看来,康熙帝准备在允禵班师后,册立皇储之前,将允禔迁往郑家庄。

最终选定郑家庄作为废太子移住之地,康熙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郑家庄距京城相对较远,有重兵驻守,允禔移居于此,被隔离于清朝政治中心之外,不易与京城联络,难以重新聚集党羽。郑家庄临近汤泉,康熙帝晚年百病缠身,足疾犹重,需要常去汤泉疗养。郑家庄又是康熙帝出巡塞外往返京城时频频驻蹕之地,在此建造行宫,既便于休憩,又有利于他随时了解废太子动向,及时采取对策。

郑家庄王府、行宫建成后第二年,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,69岁的康熙帝突然病逝。他册立允禵为储君并移允禔至郑家庄的意愿,均成泡影。皇四子胤禛出人意料地继承皇位,是为雍正帝。

新君继位,废太子允禔十年希冀一朝破灭,精神上受到致命打击。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,雍正二年十二月逝于景山禁所。允禔生前未曾抵达为他而建的郑家庄“王府”,他死后,雍正帝命择定出殡日期,送至郑家庄,设棚安厝。允禔被迫封为和硕理亲王,赐谥“密”,葬在蓟州黄花山下理密亲王园寝。

将废太子允禔迁往郑家庄,是康熙帝晚年实施秘密建储计划的一个步骤,因康熙帝猝死,这一计划未能完成。雍正帝吸取其父建储失败的教训,于雍正元年宣布实行秘密建储。乾隆帝继位后,将秘密建储定为制度,为其后历代清帝遵行。

杨珍《中国文化报》